

争论中的中美关系、地区安全与全球治理

——第 10 届“中美关系、地区安全与全球治理对话”会议综述^①

蔡翠红^②

2010 年 5 月 26—27 日，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美国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 CSIS）以及美国亚洲基金会（The Asia Foundation）共同举办的第 10 届“中美关系、地区安全与全球治理对话”在复旦大学举行。近七十名与会人员中，美方专家代表分别来自太平洋论坛、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乔治敦大学、美国国防大学、美利坚大学、威顿伯格（Witternberg）大学、海军分析中心（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美国国家资源安全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亚洲基金会等单位。中方代表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防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美国学会等单位。此外，作为中美对话的后备力量，还有由太平洋论坛组织的来自大陆两岸及美国、日本的 18 名“年轻领导者”以及由亚洲基金会组织的来自霍普金斯大学以及塔弗茨大学的研究生代表团一行九人与会。借助第二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刚结束的契机，中美两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就中美关系、地区安全与全球治理问题展开了深入和坦诚的意见交换，就如下七个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一、一年来中美关系与地区安全回顾

（一）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与地区安全

Michael Glosny（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指出，奥巴马政府对亚洲的外交政策已经开始成形。一是美国逐渐体现出对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上合作解决方案的需求认知。全球问题的跨国性及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扩散和多极化，都使美国呼吁并敦促其他各国加深参与度，尤其是新兴大国如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等等。这不仅仅是单向责任要求，而是一种双向的责任与利益，其他各国在承担更多责任的同时也有理由在建构及维持国际秩序中拥有更多权力。二是美国提升了在亚洲地区的存在，例如增加高层互访、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参加东亚峰会、派驻新的东盟大使等等。东亚地区整合也受到了更多关注。他认为，东盟仍然是主导这一进程的合理选择，尽管有来自东北亚的竞争性压力。通过一系列声明以及主动参与，美国在过去一年中一直强调其已重返亚洲，并希望在区域构建中发挥作用。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则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的三个层面：一是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与菲律宾的盟国关系。二是推进中美关系向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方向发展。三是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希拉里一年内两度造访东盟国家、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奥巴马强调与印尼及越南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其缅甸政策等等。

关于地区安全，陶文钊特别指出了对之有积极意义的 2010 年初成立的中国

^① 本文载于《美国问题研究》2010 年第 2 期。

^② 蔡翠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借此机会，作者特别感谢吴心伯教授对本文原稿的仔细审校及修改意见。此外，作者还要感谢邓铃凌同学在会务过程及录音处理方面的大力协助。

-东盟自由贸易区。覆盖 11 个国家 19 亿人口和世界贸易总额的 14% 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安全意义在于，它不仅说明了中国睦邻友好政策的成功，而且刺激了地区内的经贸关系发展，使地区整合又向前走了一步，因而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中美关系近期发展及原因分析

陶文钊首先指出了 2009 年的中美双边关系很有“建设性”。中美关系顺利经历了从布什到奥巴马政府的过渡。2009 年四月份两国领导人会面，并将中美关系定位为“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双边关系”；七月末，首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成功召开；十一月份，奥巴马顺利首次访问中国等等。奥巴马访问北京时签署的

《中美联合声明》被认为是中美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因为这次联合声明首次提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诸如气候变化、金融危机、能源等问题，特别强调了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还指出了中美在追求开放的、包容的地区合作框架方面的广泛共同利益。这些都说明了比上世纪九十年代更加和谐平衡的中美双边关系开始出现。此外，最近刚召开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具有重要意义，对话签署了涵盖方方面面的 26 条协议，如能源、环境、气候变化、维和行动、高科技、执法甚至关税等。

Michael Glosny 也认为，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一直受益于双方共同应对全球问题所达成的共识。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经济复苏比预计要快。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改革全球金融机构的进程，加强了中美在实行刺激方案和阻止贸易保护主义方面的合作。尽管美国主流观点关注中国国力增强后的过分自信与进攻性，但是 Glosny 认为这更多地只是体现在言辞上。通过鼓励中国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强调共同利益和积极关系所带来的意义，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和中国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尽管中美关系在奥巴马上台后有令人振奋的开始，但是美国对台售武以及奥巴马会见达赖导致双边关系发展在 2010 年初进入颠簸阶段。陶文钊认为，这说明中美关系的基本面并没有变，并未因为中美建交三十年的发展而改变。中美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但同时许多问题上也有分歧。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事实都不会改变。虽然有波折和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次的颠簸还不如 1995 年与 1999 年时严重，中美双边关系的主流仍然是向前发展。

中美双方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存在越来越大的分歧。虽然奥巴马政府事后解释称一切都按老规矩在办，但这并不能令中方信服。对于中国的强烈反应，与会中方专家认为有几方面原因：一是在时机选择上。陶文钊认为，奥巴马访问北京时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对相互核心利益的尊重并未得到执行。中方所强调的对相互核心利益认知的意义在于向美国传递出中国将继续期望华盛顿对台售武器立场的转变。在这点上，中国的高度预期变成了高度失望。杨毅（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前所长、少将）也认为，徐才厚将军访美时中美刚达成了一定的合作协议后就发生了美对台军售，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举动无疑激起了中国军方的愤怒感甚至羞辱感。于滨（美国威顿伯格大学政治系教授）则指出奥巴马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个月后就宣布了对台售武，在中国人看来，道义上与政治上都觉得受到打击。二是双边关系的平衡到了新的阶段。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一定程度上，中国在崛起，美国在衰落。陶文钊认为，中国的国力大大增强后自然期待美国更多地尊重其国家利益，甚至期待美国能够按照 1982 年的中美联合公报逐步改变对台售武政策。袁鹏（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也指

出,美国认为对台军售及其总统会见达赖都是潜规则,而中国认为已到了该重新考虑的时候。三是目前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已不同于布什政府时期。杨毅和于滨都认为,台湾问题已从当时的中美联合控制陈水扁到如今两岸互动的和平与发展时期,两岸关系已大大改善,然而美国的对台政策依然停留在30年前的状态,并没有因变化的环境变化而变化。对此,Ralph Cossa(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则以两岸关系缓和后大陆增加导弹部署进行了反问,并认为美对台军售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并没有矛盾。此外,陶文钊还提到,美国曾帮助中国阻挠陈水扁政府的台独倾向中的积极表现、过渡期内中美双边关系早期的顺利、战略经济对话的开展、奥巴马的访华,这些都似乎使人们产生了对中美关系的更多期待。

美方专家也指出了几点原因。一是对联合声明中“核心利益”理解的落差。Bonnie Glaser(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提到了联合声明协商过程中的“核心利益”当时是指新疆和西藏而并未包括台湾的传言,当即遭到了所有中方专家的反驳。她还提出了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阻止美国对台售武并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观点,同样立刻遭到了陶文钊等中方专家的批判。虽然有对核心利益的不同解释,但是没有哪个中国学者会否认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包括台湾及相关联的对台售武问题。二是对联合声明的地位和重要性中美认定也有不同。中国将联合声明提到了与历史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同一高度的位置,而美国并未对此如此重视。这可以解释中国对此期望值更大从而导致了失望的原因。

(三) 中美关系问题与挑战

陶文钊认为,在中国看来,在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仍未解决的双边问题包括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更好的接纳中国的对美投资、解除美国对华出口控制等三方面。在美方看来,这次对话尚未解决的问题则包括两方面。一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以及贸易顺差问题。二是所谓的政府买单与自主创新问题。Michael Glosny 警告说,越来越多人认为,中国逐渐增长的“自主创新”(Indigenous Innovation)意识代表了其重商主义态度和对外商投资的抵触,这将导致在华外商的沮丧与失望,从而影响外国在华投资。中美关系中的经贸层面一直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方面。一旦经贸方面出现问题,中美双边关系就可能出现麻烦。

陶文钊认为考验今年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两点。首先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他认为奥巴马总统对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应有足够的认识,但担心国会对此事的干涉与施压可能造成中美贸易战。如果中国被列为货币操纵国,中美之间就可能发生贸易战,而贸易战对中美乃至全球贸易都将产生严重伤害,因此中美贸易战不会有赢家,也不能打。他还指出人民币汇率问题在美国被政治化的现象,指出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平衡双边贸易,也不会为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次,朝鲜半岛形势也是对双边关系的考验,恶化的朝鲜半岛形势可能引发美国在此区域增加驻军,尤其是“天安”舰沉船事件引发的美国对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恶化的认知。

Michael Glosny 则认为目前中美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是人民币汇率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已经意识到了这点,即一些短期的刺激措施可能与全球经济失衡纠正的需要背道而驰。其次,他对中美军事关系表示了失望。尽管中美关系似乎有所缓和,但停滞不前的军事关系不仅阻碍了互信,而且使中国军方给美国留下了负面印象。再次,他还表示了对中国的过分自信与咄咄逼人的担心。金融危机提升了中国作为全球金融大国的地位,使中国更加谋求在国际秩序中的新地位。在一些欧美国家眼中,中国的

过分自信已威胁到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从而挑战了世界秩序。

中美双方还就中美谁更需要对方以及核心利益进行了辩论。关于美国与中国谁更需要谁的问题，陶文钊认为没有意义。他指出，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经常说中国更需要美国，而现在美国的说法是我们相互需要对方，事实是中美谁都不能失去对方。Michael Glosny 也认为谁更需要对方的问题不仅令人心焦而且没有讨论意义。事实上，如果没有中美合作，没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共同合作，许多全球问题都无法解决。

核心利益问题自始至终是一个争论热点。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指出，表面上看，中美关系最近的波折某种程度上似乎是美国对更加自信的中国的不适应，但深层次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双方对相互核心利益的不同解释。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陈东晓、陶文钊、于滨等都认为，中美有着不同的核心利益定义。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采取的是一种内向的狭窄的定义，领土完整、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就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它有很明确的界限。而美国以一种更宽泛的方式来定义自己的核心利益，领土安全与盟友保护都被认为是其核心利益，因而即使是本土 4000 英里外的事情也可能被美国视为其核心利益的一部分。吴心伯认为，中美核心利益定义方式的不同不仅反映了中美彼此实力的差距，也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政治哲学。他还警告，根据历史教训，在定义及追求国家利益时，意识到能力的有限性并制定与实力相匹配的外交政策是非常必要的。针对于滨所提的中美核心利益的解释不对称问题，Michael Glosny 反驳说，中美核心利益不对称的言下之意似乎意味着中国的核心利益比美国的更受到威胁。尽管美国领土完整确实没有像中国那样受到威胁，但是这种逻辑的背后似乎是中国对美国核心利益定义的藐视，即“中国的核心利益比美国的重要”。他认为核心利益的讨论应让位于共同利益，因为核心利益的思维方式导致的是一种讨价还价式的利益交换的零和竞争游戏。而如果以共同利益为中心，则可以求同存异，从而更好地推动中美关系相互依存与发展。

二、美日同盟的变化与影响

（一）日本民主党政府对美日同盟的态度变化

吴心伯认为，日本民主党政府对美日同盟态度的主要特点是寻求美日关系更多的平等性、寻求日本关切与利益的兼容性、以及更多关注全球挑战方面的合作而非仅仅传统安全合作。他认为这反应了日本国内政治的演变，同时也反应了其对美日联盟的反思。对于前者，日本民主党代表的是日本政治的左派，他们主张更少依赖美日同盟而寻求自主身份。对于后者，日本民主党越来越清楚美日同盟对于日本外交与安全利益拓展的局限与不利，美日联盟不应是日本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唯一支柱。这同时也反应了日本长期以来对正常化国家地位的渴望与期待，即日本不仅应是一个政治大国，不仅在国际事务中有主动权，而且在美日同盟中应有平等地位。这还是日本民族主义的一种体现，美国应该逐渐适应敢讲“不”的日本。

Brad Glosserman（美国太平洋论坛执行主任）则认为不存在单一的日本民主党对美日同盟的政策。政府是多种力量的复合体，一个政党并不能代替政府。如果日本对美日同盟有政策变化，其原因则包括三方面，一是美国力量与影响的相对衰落，二是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的反应，三是对美日关系中不平衡的纠正。他不赞成用民族主义来解释日本的政策变化。郭定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也指出,日本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外交政策没有本质区别。民主党上台前强调与自民党的不同,但是真正上台后,很快就接近自民党的立场与政策。这呼应了吴心伯提出的学习曲线综合症(Learning Curve Syndrome),即日本民主党从在野党变成执政党需要一个学习曲线过程,经过一段时间适应过程后,民主党对美日同盟的态度会慢慢回归常态。

(二) 美日同盟的走向

关于美日同盟的走向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美日同盟的基本框架与重要性。吴心伯认为美日同盟不会有结构性改变,其基本框架不会因为民主党上台而改变。Brad Glosserman 也认为,对于宣称不追求核武及军事大国地位的日本而言,美日同盟所提供的安全威慑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很重要。美日同盟框架下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对日本必不可少,而且这种“公共产品”对于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不可或缺。他还引证了日本公众民意对美日同盟的支持,即 75%的日本人认为美日同盟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有重要作用。目前美日同盟遇到的问题只是插曲,通过美日共同努力和学习曲线,最后还会回到原状。日本也不是美国所遇到的第一个盟国问题。美国与新西兰、菲律宾、韩国都出现过问题。多数情况下,美国都通过调整联盟政策或者迁移军事基地等作了适当调整。美日同盟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缩小日本的能力与美国对其预期之间的差距。此外,美日同盟的重要性认同也随着东亚安全局势而有所变化。郭定平指出,日本在东亚和平稳定时往往强调美日关系的平等与平衡,但是当存在安全不确定性、冲突或者危机时则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正如“天安”舰事件加强了美日同盟一样。

二是关于美日同盟的性质与合作范围。吴心伯认为不同的美国政府对美日同盟的看法有所区别。冷战结束时,老布什曾提出与日本建立全球合作伙伴的关系。但是,克林顿政府与小布什政府期间,美国强调的是美日同盟的安全功能。奥巴马政府则更加强调美日同盟的多层次发展及今后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而非仅仅亚太安全事务等等。陶文钊对此表示赞同。Glosserman 认为应该区分美日同盟与美日关系。美日同盟只是美日关系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应看到更广泛的美日关系。

三是关于美日同盟的行动方式。吴心伯指出,美日同盟虽然不会有结构性改变,但在具体行动方式上会有调整。为了寻求更多平等性,东京会在美日同盟日程设定方面更主动,会要求与日本更多的协商,会在双边关系中更多讨价还价。但 Brad Glosserman 则认为,日本对于美日关系更多平等性的要求是美国所有盟友关系中的老问题,并认为目前美日同盟中的平等性比以往都更大。

(三) 对美国亚太政策及地区安全的影响

关于美国的亚太政策,一方面,与会者认为东亚地区的政治与战略状况以及日本的国内外制约,都注定了日本在地区及全球安全中的作用局限性,美国将重新评估日本在地区安全中的角色,并扩大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吴心伯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美日同盟一直被认为对美国的地区安全政策很重要,甚至有政策精英建议将日本变成“东亚的英国”。小布什不仅试图将日本变成其在本地区联盟体系的核心,而且敦促日本在全球安全体系中积极作为。然而,奥巴马在维持与传统盟友合作关系的同时,也在寻求与地区主要国家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甚至越南加强合作,而日本民主党的上台正好与奥巴马的盟友战略相吻合。Brad Glosserman 也提到,日本在人口结构、经济模式、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都非常明显,这将减弱东京在该地区及全球的影响力与作用,并导致美国与其他国家建立更多的联系。

另一方面，针对美日联盟本身，Brad Glosserman 认为美国可以采取“巧实力”指引下的盟国战略来抵消盟国力量消长因素。具体而言，他认为美国可以利用日本民主党的左派倾向和尝试新机会的意愿，从盟国关系中的一些“禁忌”问题入手，例如讨论秘密核协议和武器出口控制、推进导弹防御计划等，认为美国应鼓励日本在自身防卫和地区威慑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鼓励日本更加积极融入导弹防御系统等。当然，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是美国的经济能力对其自身机遇及盟国选择的影响。

对于地区安全，吴心伯认为，日本民主党的执政有利于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平衡及东亚合作的推进。日本希望更多关注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关系，从而使其对外关系更加平衡，同时也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根据日本媒体报道，鸠山曾向胡主席提出日本希望加强与中国、韩国及东盟的合作，从而共同推动以中日为中心的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尽管东盟在其领导力受到怀疑的同时还希望主导地区整合，但是中国与日本对东亚合作的推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即使不是主导者，也是主要推动者。

美国方面的观点则集中在美日同盟可以发挥地区权力转移过程的管理作用，即认为美日同盟可以针对新兴威胁，尤其是中国对其盟友体系及地区安全的威胁。Ralph Cossa 认为美日同盟可以发挥管理（manage）中国崛起的作用，即使之崛起的方式不能威胁到别国的利益。Brad Glosserman 认为中国的力量上升一定程度上使美日关系更加紧密，日本已将中国视为一个威胁，中国需要采取更多行动向日本表明自己的战略意图。但是吴心伯认为，虽然第三方因素对任何传统联盟都有一定的粘结剂作用，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美日同盟似乎是遏制中国的主要工具。但是，他认为美日视中国为挑战，但不是安全威胁，因此他不相信美日联盟的意义在于遏制中国，那样不符合美日国家利益。当然，中国应该更好地向美日表明自己的长期战略意图以消除他们的疑虑。

三、两岸关系现状与展望

（一）两岸关系现状

关于两岸关系现状，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认为，目前两岸关系达到了新的阶段，比陈水扁时期和李登辉时期都要好，标志包括两岸三通的真正实现、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简称 ECFA）的初步达成、台独倾向下降等。陶文钊还提到了海协会与海基会的第四次会议成功签署的二十多项协议，以及大陆方面显示出更多的耐心等等。Bonnie Glaser 认为两岸关系最重要的成果是可靠的交流与协商渠道的建立，因为这大大降低了相互误解的可能性。两岸都很小心地尽量不挑战对方的主权立场。马英九不直接批评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北京也不排除“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但是两岸关系也不乏负面因素。黄仁伟指出，两岸政治方面还未达成一致意见，台湾的政治地位问题、政治空间问题、一个中国的涵义与内容问题等都有待进一步商讨。台湾岛内的政治分歧依然很严重。Bonnie Glaser 也指出，尽管两岸关系目前进展平稳，但还是相互不太满意：大陆方面认为马英九太过谨慎；对大陆提了太多要求（更多国际空间、ECFA、拆除导弹等等）；在政治军事问题上进展缓慢；在两岸领导人见面以及讨论和平协议方面反映冷淡等。而台湾方面也认为大陆在减少对台军事威胁上没有任何行动；大陆继续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大陆对台湾与其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有保留意见等。

与会者还就当前台湾所感到的威胁进行了辩论。于滨提出，大陆方面的导弹部署是与中美关系及台湾问题的现状相关的。部署导弹是为了遏制台独，并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对台独的遏制不能等同于威胁。杨毅也认为台湾军方目前并没有感到来自大陆的军事威胁，至少这种威胁越来越少。Bonnie Glaser 则不同意杨毅所说的，认为台湾确实感受到了大陆的军事威胁。而陈东晓则指出，根据调查，台湾民众的最大担心目前并不是来自大陆的军事威胁，而是其经济上被大陆所吸收。这也正是对于 ECFA 的意见两极分化的原因。

（二）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

黄仁伟认为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这些因素包括美国鼓励两岸进行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多层面会谈协商；美国支持台湾争取非正式的国际空间，并在此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美台自由贸易协定正在协商恢复中；美国继续对台售武。美国对台售武目前是中美关系中主要的负面因素，中国始终认为美国对台售武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Bonnie Glaser 则重点阐述了美国对台政策及美国在台湾的利益。美国对台政策目标并不是两岸分离，也不是保持现状，不是阻止两岸关系发展。美国致力于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她认为美国在台湾拥有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支持台湾的民主）和安全利益（维持台海和平），但是并没有战略利益。台湾不是美国用来制约中国的一张牌。美国在台湾驻军只是少数人的建议，不是美国主流观点，也不是军方观点。两岸关系的紧张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目前两岸关系的改善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好处，减少了战争风险，这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欢迎两岸关系的缓和，呼吁两岸关系的改善（如军事互信的建立），主张通过对话解决争端。美国支持 ECFA，因为台湾的竞争力会因此提升，台湾的经济会进一步得到发展，同时还可以使台湾在地区经济整合过程中不被边缘化，并可以为两岸其他事项的讨论投石铺路。美国希望在台海稳定局势的大前提下，看到台湾在没有外界压力下自主选择自己的未来。美国坚信这种选择权在于台湾人民，她认为如果台湾人民有一天选择成为大中国的一部分，美国绝对不会挡道。Ralph Cossa 则强调美国对台售武是一种策略，美国的目的是维持台海稳定，并使两岸维持对话状态。

美国对台售武的原因是美方的解释重点。Michael Glosny 指出，美国对台售武不是因为利益集团的关系，也不是因为奥巴马面临国内问题而希望借此获得国内支持。Bonnie Glaser 认为美国对台军售的原因具体有三方面，一是增强台湾自卫的能力、平衡大陆日益壮大的军事力量，二是为马英九与大陆谈判提供自信心，三是为了美国的诚信，因为这是《与台湾关系法》的一部分。因此，她认为近期内美国对台售武对两岸关系不一定有害。如果美国停止了军售，台湾可能将重新调整政治及防御策略，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存在重新开发核武器的可能性，因而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她认为中国没有遵守 1982 年中美联合公报中的仅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诺言，所以美国也不可能明确逐步减少直至最后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她还认为美国今年对台军售宣布时间选择与内容都考虑到了中国的利益，即时间选择在两岸关系取得了许多进步后，内容上也排除了最先进的技术和武器。Ralph Cossa 还指出，奥巴马政府并没有签署新的对台售武合同，这只是落实以前的遗留订单，这或许可以说明当前政府在对台售武方面的中间政策。而中方与会者则认为这种时机选择恰恰是最糟糕的，因为这使美国失信于中国，加剧了中国的沮丧与愤怒。同时，黄仁伟指出，如果美国继续对台售武，政策成本会越来越高，从而会严重影响中美关系，因为台湾技术上和经济上都将越来越

难以承受国防压力和沉重负担，同时越来越多台湾人认为军售与台美军事合作如参与美国太平洋防卫体系符合美国的利益，却不是台湾的利益所在。

（三）两岸关系未来展望

展望两岸关系的未来，黄仁伟认为两岸社会文化联系将进一步拓展至各领域，如教育、社保、大陆对台制造业及金融投资等；ECFA 签署后，台湾可能会与其他经济体进一步讨论自由贸易区问题。台湾的岛内民意将向中间移动，更多人期待与大陆的关系改善会给台湾更多经济上或者政治上的好处。他还预测非正式的政治安全对话可能在今后两年或者在国民党的第二任期内发生。然而即使民进党上台，台独依然不会得逞，两岸关系依然将和平发展。杨毅也指出，目前两岸三通的建立和两岸紧密的经济联系是历史的潮流，是谁也无法逆转的趋势。

Bonnie Glaser 认为两岸应继续坚持“先易后难，先经后政”。过早地触及那些敏感话题，可能会损害两岸关系所取得的成果。两岸关系发展节拍是由台湾岛内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两岸关系中的问题必须由两岸自己来解决。台湾不是一个问题，不能由中美跳过台湾来解决。大陆不能逼迫美国就台湾问题进行对话，或者试图重新签订新的公报或老公报新解，而应该与台湾直接协商。她认为减少美国对台售武的主动权在于北京，即减少对台军事威胁，建立互信机制以降低冲突可能性，同时采取措施赢取台湾大众的民心。同时，她认为如果大陆撤销导弹部署，台湾的安全感增强后可能就不会愿意将 3%的预算用于向美国购买军火。此外，两岸关系需要新思维。“一国两制”已经不管用。她特别提到了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驰最近在《中国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大陆应接受中华民国存在这一事实的观点。陶文钊认为，台湾依然向美国购买武器说明两岸互信还不够。而杨毅则提出，虽然中国确实希望美国改变其对台政策，但中国不会采取逼迫行为，最终迫使美国改变其对台政策的将是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黄仁伟乐观地表示，美国对台售武虽然仍然会继续存在，但可能会发生一定变化，比如在规模、级别以及预先与中国大陆商量方面等。

四、朝核问题与“天安”舰事件

（一）朝鲜近期行为的动机分析

刘鸣（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认为，朝鲜第二次核试验代表了其军事、政治和技术方面的飞跃，同时也为了转移注意力以减轻由于遭受制裁而产生的国内压力。迫于中国和许多国家 2009 年秋以来的制裁压力以及其恶化的经济形势，朝鲜已经不再坚持“决不参加六方会谈”的誓言，不情愿地同意有条件地回到六方会谈，即取消联合国安理会根据 1874 号决议对朝鲜的制裁、签署美朝和平协议。从这些要求中，我们可以看出朝鲜只是想用六方会谈作为与美国直接对话的平台，并想颠倒去核化和获得安全保障的次序。然而，朝鲜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们拒绝或延迟回到六方会谈，其境况就会进一步恶化，大规模援助也没有保证。因此，他们所设的前提条件不是绝对的，朝鲜现在需要的是美国的软化姿态或者面子承诺。

同时，朝鲜不愿意现在就放弃核项目，而是希望利用弃核作为无止境的谈判筹码，以改善他们的境况并换取美韩和日本的“奖励”。2009 年夏天以来，朝鲜表现出许多不安分的行动。为了有效地向韩国施压促其继续进行官方对话和经济合作项目（如金刚山和开城工业区的合作项目），朝鲜还向韩国展开了心理战，包括在黄海的开炮行为。朝鲜的目的就是试图借助妥协来改善与美韩的关系。然而，美韩强烈的原则性立场没有出现任何妥协，其中之一就是朝鲜必须回到六方

会谈框架讨论核问题。

（二）美国的立场和战术

刘鸣认为，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是战略耐心和不附和朝鲜的挑衅。奥巴马政府从布什政府吸取了很多教训，包括以战略耐心对付朝鲜的新挑衅行动。美国的底线是朝鲜必须无条件回到六方会谈，重申 2005 年 9 月 19 日《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对于六方会谈，美国不可能放弃，因为这是能够影响朝鲜、继续去核化进程从而阻止朝鲜进一步破坏东北亚战略平衡的唯一多边渠道。这种作用即使不是实质性的，至少也有形式上的意义。但美国学术界存在着一个共识，即朝鲜不可能放弃核项目。

奥巴马政府和他的安全团队也许期待朝鲜可能不得不屈服于制裁和防扩散安全倡议（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 PSI）的压力，为了保全政权而作出某种妥协。如果朝鲜回到谈判桌，美国将对朝鲜采取更严格清晰的去核化政策，将以李明博的“大妥协”方案（Grand Bargain Plan，即在朝鲜废弃核计划的同时保障其体制安全，并由国际社会提供援助）为条件要求朝鲜“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转”（CVID）地弃核。否则，美国就不得等朝鲜换新的领导人。

美国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目前面临着两难困境。在这场华盛顿——平壤博弈中，似乎美国占据了上风。美国拒绝朝鲜直接对话及和平协议谈判的要求使朝鲜一无所获。然而，随着僵局的持续，朝鲜很可能拥有更多的核弹头并可能在弹头小型化方面有实质性进展，从而导致朝鲜的核进程不可逆转。

（三）“天安”舰事件以及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刘鸣认为，“天安”舰事件极大地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尽管韩国要求严惩凶手，但只要朝鲜否认牵涉其中，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就很难一致支持一个惩罚决议。首尔有包括军事报复在内的多种选择，但是美国不可能支持危机升级的行动。其他选择如反潜艇联合演习、继续反朝鲜的心理宣传、禁止朝鲜船只通过济洲岛海峡、削减朝鲜产品进口等，都是在可管理的反应限度内。然而，这些反应定将加剧半岛的紧张局势，甚至可能引发南北朝鲜的军舰在黄海的另一场冲突。在这种敌对的情绪以及韩国“先解决‘天安’舰事件再举行六方会谈”的原则坚持下，短时间内六方会谈很难恢复。为了反抗美韩压力，朝鲜可能进行第三轮核试验，发射更多的导弹。所以，各方都应避免过激的行为和错误估计形势。要寻求解决当前的情况，所有的科学证据都应当公之于众并由国际专家进行评估，朝鲜也应该在公正审判前得到辩解的机会。

Ralph Cossa 根据近期与韩国各界人士的交流提出了四点关于朝鲜半岛局势和地区安全的韩国观点。其一，美韩关系目前处于最好阶段。朝鲜的导弹发射与核试验、“天安”舰事件都使美韩关系更加紧密。其二，从韩国方面看，朝鲜的威胁特别是非对称威胁目前也是最严重的。其三，韩国确信朝鲜是这次“天安”舰事件的罪魁祸首，认为对此应该有可控的但足够强硬的回应。其四，越来越多的韩国人认为，对于朝鲜问题，中国不是帮助解决问题，而是问题的一部分。他认为北京扮演了朝鲜的“辩护律师”角色，并认为中国犯了一个战略错误，即在“天安”舰事件中向韩国展示自己支持朝鲜的决心，因此把韩国推向了对美国的更大依赖和对中国动机的极度不信任。于滨对于这一点给予了反驳，如果中国作为朝鲜的辩护律师，应该可以帮助促进整个过程的正义性，从而有助于解决问题。沈丁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同样反驳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其论断的前提即“天安”舰事件是朝鲜所为还有待进一步的核实。目前也不能排除“天安”舰事件当中的阴谋论。Brad Glosserman 则表示不管最后事实真相如何，目前韩

国的愤怒都处于顶点。他理解部分中方学者提出的韩国总统在事实完全弄清楚前非理性的发言是不负责任的观点，但认为这是巨大国内政治压力使然。

讨论主要围绕“天安”舰事件后韩国反应强烈的两件事。一是中国对韩国遇难者哀悼信的迟迟到来。Bonnie Glaser 指出“天安”舰事件后中国迟迟没有发出慰问，直至事件发生一个月后才被动表示的事实损伤了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同时也使韩国对中国的不信任加剧。吴心伯等表示，虽然中方在这点上是有过于迟缓之嫌，但是美国应该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理解中国面临的尴尬局面，正如美国面临以色列与穆斯林国家的冲突时一样。二是关于金正日的访华日程安排。“天安”舰事件后，尽管韩国总统私下要求北京推迟或取消访问日程，金正日还是很快造访了北京。Ralph Cossa 认为此事被视为对韩国的侮辱举动，并日益加深了韩国对中国的负面印象。Michael Glosny 也指出，虽然美国对中国在之前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的立场及对六方会谈的推动等表示满意，但是最近的事端使美国逐渐认为中国政府的行为似乎是在支持平壤的政权，并使一些美国人士开始质疑中国的维稳立场。沈丁立指出这应是预先的安排，因而不便改变。鉴于说服朝鲜放弃核计划非常困难，中国邀请金正日来北京做最后的努力。关于“天安”舰事件，目前最重要的是冷静理性的回应并以谨慎的调查来消除所有怀疑。

与会者还就如果“天安”舰事件真是朝鲜所为那么其动机为何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刘鸣等中方专家认为应是朝鲜对 2009 年其海军被袭事件的报复，当时韩国向一艘闯过“北方分界线”的朝鲜舰艇开火。然而，Ralph Cossa 等美方专家则认为这场危机是由朝鲜高层一手策划的，或是作为其连任的砝码，或是希望通过武力行动来回应外界对于其“流氓国家”的指责，或是作为对美韩提出的战略忍耐姿态的反击。虽然目前对于这些疑问给出明确的答案为时尚早，但是美方专家认为可以明确的是此次事件后，韩国为了寻求国家安全将推动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将加强美韩联盟，将抛弃和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的幻想。同时，“天安”舰事件也将加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权，是美国提升其主导地位的一次机会。

五、对外援助与全球治理

（一）中国对非援助的特点、作用与挑战

中国的对非援助近年来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贺文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首先分析了中国对非援助的特点。一是“不附加条件”的援助政策。中国将对非援助视为一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是穷帮穷”（“poor help poor”）的模式。中国的对非政策强调不干涉内政和尊重非洲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之所以采取这一有别于西方的对非政策，主要基于同为被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痛苦历史记忆以及如今现实世界中同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发展课题和挑战。二是重视双边援助而非多边援助。直到 1971 年进入联合国后，中国才开始参与多边援助，但仍以双边援助为主。中国至今仍主要采取双边援助为主模式的原因主要有历史因素的经验考虑、双边模式的援助实施效率考虑以及不隶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体系等。但多边援助模式的推进也必将随着“非洲联盟”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的不断走向成熟而扩大。三是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项目”而非研究及能力建设等“软件项目”。这是中国自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功的“要想富，先修路”经验的延伸。近年来，认识到“软实力”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中国外援也开始进入诸如人力资源培训、技术和管理合

作以及中文教学等“软件项目”领域。

贺文萍同时指出了中国对非援助的作用及面临的挑战。一方面，中国对非援助产生了积极成效，有力促进了非洲的经济复苏和增长。中非关系的深入开展还客观上带动了国际社会更多地关注非洲，使得非洲在选择其发展伙伴时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并推动了非洲内部形成统一战略和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但 Carol Lancaster(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事务学院院长)表示了对非洲经济增长与中国对非援助两者直接因果关系的谨慎。她认为非洲人公开场合或者官方往往夸大中国对非洲的援助，私下的交流就不一定如此。中国的对非援助有积极影响，但是正如美国的外援一样，都是好坏兼而有之的。

另一方面，中国对非援助也面临着挑战，如处理好“传统”和“新兴”捐助国的关系，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和协调性，以及需采取更多措施提升其援助的管理和监督体系，培养更多的援助专门人才等。张海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则指出了中国的对外援助面临的三点“平衡”挑战：平衡国内国际利益即透明度问题、平衡国家与市场的利益、平衡不干涉内政原则与积极参与当地事务等。吴心伯等还指出中国对外援助需要避免“装饰门面的工程”，对外援助的内容要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尽管有时是应对方所要求。

(二) 美国对外援助的发展与变化

Carol Lancaster 认为美国的对外援助正处于显著变化期，并分析了美国近年来对外援助变化的特点。一是援助总量在快速上升。美国国内各党派对外援的支持都很坚挺，特别是传统上对外援很谨慎的保守派也开始发生转变。二是美国对外援助的目的在变化。传统上美国对外援助的目的包括三点，分别是支持社会与经济发展、外交的需要和人道主义援助。当前目的除了传统的三点外，还增加了健康，特别是传染病如艾滋病防治。布什政府创立的“总统艾滋病救治应急基金”(President's Emergency Fund for AIDs Relief)对健康方面的外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现在新兴的援助方向还有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等。三是援助来源渠道在扩展。援助资源从“一对一”向“多到多”发展。除了美国政府这一主要来源，很多私营部门、基金会、风险资本家、宗教团体、大学等等都开始参与到外援中并对外援总量有很大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际开发总署(USAID)成立的“公私伙伴关系办公室”对私营企业实施对外援助提供了很多帮助。四是提供援助的条件与评估模式都在变化，从以前的需求导向性转向为绩效导向性(类似于货到付款)，从根据规模确定援助大小到根据结果确定援助量。五是美国政府组织外援的方式也在变化。在这点上，Carol Lancaster 主要表达了对目前美国外援组织机构与管理的碎片化现象的担心——美国目前有 29 个政府机构参与对外援助。

美国以上对外援助变化主要缘于几方面原因，即全球背景的变化、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技术的进步、社会责任意识的加强以及私人基金的富裕等。她认为如果没有大的灾难(包括人为的、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美国的对外援助应该会继续。

(三) 中美对外援助方面的争论与合作前景

中美在对外援助方面的讨论集中在三方面：其一，中国对外援助透明度问题。Carol Lancaster 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认为可能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中国就是没有具体的对外援助数据，因为东西方关于援助的定义不同，中国也不象西方那样进行对外援助统计；二是不同地方和不同部门都可能分别有对外援助，使数据追踪很困难；三是中国政府不想公开对外援助数据，因为中国尚有许多贫穷的

地方需要政府更多的投资，政府需要平衡国内与国外的利益。张海冰对此表示赞同。贺文萍也指出目前中国对于援助、投资与贸易之间的混淆导致确切的数据很难获得。

其二，中国对外援助是否有附带条件的问题。Carol Lancaster 认为既然中国援助的目的在于共同发展，那么中国政府在对外援助背后是拥有国家利益的，否则政府就是不负责任。她认为中国政府在援助背后必然有着政治动机或者资源与经济动机。关于受援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否是中国对其提供援助的条件，张海冰认为，台湾问题是我们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前提，并不是对外援助的前提条件。贺文萍则指出，台湾问题很特殊，它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的不附加条件是指中国在如何发展经济、如何选择政治发展道路上不给非洲国家任何要求或建议。中国在提供中国劳工和器械方面也有一定的对外援助条件，这点与一些西方国家类似。如果适用严格标准，即使是“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的成员国也无法完全合乎要求。当然，中国应该在这方面有所改进。

其三，中美对外援助的分歧与合作。张海冰认为虽然中美在援助问题上有许多不同见解，但可以找到最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共同发展。中美对外援助有三点不同：美国认为良治是发展的前提，而中国认为发展是可用来解决诸如贫穷、冲突、稳定、良治问题的资源；中国可能更注重硬件，而美国集中于软件的建设；两国实行援助的优势不一样，中国在政府对政府援助方面做得更好，而美国更擅长私人领域的援助。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中美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丁幸豪（上海美国学会会长）还提到了一些非洲受援国试图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寻求平衡，中美需要在对外援助上进一步合作与协调。Carol Lancaster 则提到了中美在对外援助方面的确有合作，虽然这种合作并不怎么为人所知，例如中美在对阿富汗援助计划中的合作修路协议。

六、气候变化与全球治理

（一）哥本哈根会议的成败得失

薄燕（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首先总结了哥本哈根会议的五点教训。一是决策过程方面，哥本哈根会议在程序性事务上花了太多时间，并且让所有的与会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以至于忽略了讨论协议的真实内容，这是进程中严重的低效。Alvin Lin(美国国家资源安全委员会中国气候与能源政策协调员)也同意哥本哈根会议的程序混乱，并指出在全会举行前应先进行小范围讨论的必要性。二是互信赤字，即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阵营内部和发展中国家阵营内部的互信不足。三是主权优先，即虽然所有参会者认同这个问题的全球性，但结论仍然是基于本国利益所考虑的。作为集体行动的困境，各方仍未就分配成本的公平原则达成一致。发达国家所要求的“可测量的、可报道的、可核实的”（“measurable, reportable and verifiable, MRV”）减排任务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负担，并使他们受制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控制。四是权力转移，哥本哈根会议上出现了从欧盟到发展中国家的明显权力转移。欧盟在气候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以及 BASIC(Brazil, South Africa, India, and China)国家不断增强的话语权，使欧盟失去了原本的主导地位。五是协议形式方面，哥本哈根协议是至下而上而不是至上而下的带有声明性质的政治宣誓。它包含了一些行动决心，但是却没有相关目标。如果不采取进一步行动，许多条款都无法操作。

尽管如此，哥本哈根会议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Alvin Lin 认为哥本哈根

会议有三方面的积极意义。其一，那些之前并没有减排目标的国家开始制定了减排目标。它使各国认识到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解决碳排放问题的必要性。其二，哥本哈根会议达成了一定的融资协议。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主要发达国家承诺从2010年到2012年每年提供100亿，到2020年总共达到1000亿的资金投入。其三，中国与其他 BASIC 国家同意进行更频繁的协商与交流。

（二）未来气候变化协议展望

针对即将召开的气候变化会议，薄燕认为，理想的墨西哥坎昆协议应该完成巴厘路线图(Bali Roadmap)所设定的目标任务，应该是一个新的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成员上应将没有签订《京都协议书》的成员吸纳进来，还应包括一些可行的金融与技术机制。但是，她认为墨西哥坎昆会议达成新的有约束力的理想的气候变化协议的希望比较小，原因有四：一是各方尚未就墨西哥会议的结果达成一致理解。有些成员如欧盟呼吁签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工具性协议，而其他一些成员则认为还为时过早。同时，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希望哥本哈根协议能够整合进新的全球协议，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这一协议还太弱，也反对整个过程的非民主性质。二是哥本哈根会议中受损的各国互信尚未得到修补，还将继续影响气候谈判。三是经济与技术问题。哥本哈根协议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减排所需的具体资金和技术来源进行讨论。四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此外，她认为气候变化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单独一个论坛的包容性和代表性不够，因此可以考虑几种讨论形式如 G20 和主要经济论坛 MEF (Major Economies Forum) 与气候变化会议的结合。

（三）中美共同推进全球气候变化合作

中美两国无疑在哥本哈根会议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吴心伯认为，哥本哈根会议上中美之间的斗争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中美拯救了这次会议，否则它将不会产生任何的协议，无论是条约还是政治协议。中国说服了主要发展中国家达成一个协议，而奥巴马总统说服欧洲人接受这个协议。作为排放大国，中美不仅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关键角色，也是利益相关者。中美关系在这方面既是竞争者，又是合作者。

为了促进全球气候变化合作，薄燕认为中美应采取下列措施：一是减少相互的不信任。二是以行动而不是目标为中心。Jonathan Stromseth(美国亚洲基金会驻华代表)也认为，在美国国内政治有很多未知数的情况下，美国推动签订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有一定难度。中国虽然国际姿态比较保守，但是却在国内有许多实际行动。中美可以在减排的一些具体行动上合作。三是根据哥本哈根会议实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快速启动资金从而推动具体实施行动并确立互信。四是中美应加强联合国程序及主要经济论坛(MEF)方面的合作，以提高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方面的话语权。中美两国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吴心伯则提醒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的说法并不意味着应该将中国与美国在许多方面相提并论，中美发展程度和人均 GDP 排放量都有很大差异。气候变化对中国来说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经济、外交、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发展问题，应该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解决。陶文钊还提到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绿色能源行业不能任由市场主导，政府应进行先期投资等。

此外，Alvin Lin 补充认为中美除了建立互信，在气候变化方面最关键的的合作是要发展低碳科技。在这方面中国和美国有互补性的资源和能力，因而其合作是双赢的努力。他还提到了中美拟建立的“中美绿色能源研究中心”目前仍处于竞标与筹备状态。Brad Glosserman 则提了两点建议，一是推进中美日三边气

候变化讨论，二是鉴于中国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中国可以根据 GDP 的数据将中国划分为不同的发展中区域和发达区域并适用不同的标准。陆京（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访问学者）则强调了态度问题，即开放的心态比谈判姿态更重要，中美都需要有迫切采取行动的意识，并为气候合作树立一个好的典范，尽管气候变化是一个需要全球共同努力的综合性领域。

七、反海盗合作与全球治理

（一）中国参与反海盗行动的自身思考与他人印象

2008 年 12 月 26 日，中国派遣了三艘海军舰艇前往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杨毅指出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政治决定，而非军事战略计划。这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会。挑战是指准备时间的不足以及经验的缺乏，中国海军从未执行过为期三个月的非战争的海外军事行动，甚至没有航海地图。机会首先是指护航任务是一次尝试远距离海外行动的实地训练，它打开了中国海军进行海外军事行动的大门。每三个月轮换的安排在人道主义考虑的同时也是希望给予更多舰艇以锻炼机会。机会还指这对中国海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影响，因为这使中国海军意识到与发达国家海军之间的差距，意识到其长距离部署、基础导航和命令控制设备都需要更现代化。贺文萍还特别指出，中国的这一决定与其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并不冲突，因为索马里临时政府向中国发出了保卫过往商业船只的邀请，而且联合国也通过了相关决议。

Kim Hall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分析研究员) 则认为中国参与亚丁湾的反海盗行动是由基本的外交政策利益所驱使的。这些利益包含了保护过往中国船只以及保护中国与非洲、欧洲、中东的贸易联系的经济利益、发展长距离作战能力并对国际海洋安全作出贡献的军事利益以及用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外交利益。她同意杨毅的观点，认为中国通过行动来获得长距离部署方面的宝贵经验以及增进与其他海军互动的这个决定使中国获益。这一决定反映出中国对国家利益的更深理解，以及希望成为全球治理中积极一员的意愿。

Kim Hall 还指出了中国行动的负面印象。在护航国家多数以集体安全的方式打击海盗的情况下，中国舰艇主要是在护卫过往的中国船只。而且，为了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另外远在“国际推荐通行走廊”以北 5 海里开辟了一条独立的通行走廊。一方面，因该区域距离也门的打渔水域较近，容易发生中国舰艇将带枪渔民当作海盗的情况。另一方面，中国对现存行动方式的挑战在许多西方人的眼中被认为是可疑的，从而影响了军队之间的互信。中国海军目前已表示了与其他海军联合护航的兴趣，但还未真正完成这一转变。Michael Glosny 指出了中国没有能够与西方国家进行更深入合作的另一种解释，即可能认为与西方先进发达国家合作越紧密，中国看上去就越不像发展中国家。这一点被杨毅予以否定，因为这不同于其他行动，而是在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二）亚丁湾行动的合作与意义

Kim Hall 指出，中国海军在很多国际合作方面进行了努力，包括高层协商、战略战术信息共享、协调与消除冲突、航行补给和对他国的码头访问等。关于补给问题，杨毅指出中国将不会建海外基地，因为反海盗行动持续时间未知，为此投入成本高昂的基地并不值得，而且目前中国可使用沿岸国家的民用码头设施等。

杨毅认为，通过亚丁湾的行动，中美海军友谊增强，从而为今后进一步的合作和积极关系打下了良好基础。这同时说明了几点：第一，多边平台比双边平

台更稳固也更容易操作。当然这并不排除需要时达成双边协议的可能。第二，安理会授权的任务作为合作平台更容易在政治上被接受。第三，非传统安全合作比传统安全合作更简单，阻碍也更少，因而对双方都有利。袁鹏也指出，印度洋上的打击海盗活动为中美海上安全合作找到了合适的区域。印度洋不仅因为其地缘政治及能源重要性而对中美都很重要，而且同样作为后来者，中美在印度洋拥有许多共同利益。吴心伯则从中美军事关系分类上为中美合作提供了尝试性理论支持，认为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有关（如打击海盗）的中美军事关系不同于传统中美军事关系，它更能经受住双边政治关系动荡的考验。

尽管中美在亚丁湾的行动得到了不少积极评价，Kim Hall 不认为亚丁湾的经验可以增强中美在东亚和马六甲海峡的合作关系。中国和邻国关于领海的争议以及马六甲海峡沿岸的东南亚国家具有足够安全能力的事实都将限制中美合作模式在这些区域的应用。从亚丁湾学来的经验教训同样不一定适用于南中国海的中美军事合作。袁鹏则提出中美海上安全合作的基础是关注主要矛盾而降低次要矛盾。以南中国海为例，主要矛盾是中国与其他六国的领土争端，次要矛盾是中国与美国的海洋权利的争端。

（三）海盗活动的应对与建议

针对越反越频繁的海盗活动，与会专家都认为有必要对反海盗行动进行反思。专家的建议主要集中于两方面：

一是要有打击海盗的相关法律。吴心伯等专家指出，打击海盗必须要有法律框架来处理抓获的海盗，而目前的状况基本是即使抓获海盗，也没有法律手段或权威去处置或审判他们，使亚丁湾行动更像是对于船只的保护运动而非反海盗行动。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军舰参与进来，但海盗活动比以前更频繁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尽管海盗成功率已大大降低。Kim Hall 则指出，海盗是人道主义犯罪，它属于国际法而非国内法范畴，因而缺少证据与司法能力不足都是反海盗努力的挑战。短期能够打击海盗的一种方法是强化沙里亚法规（Shariah Law），因为根据这一法规，海盗是违法的。（注：沙里亚法规是一套伊斯兰教法，根据《古兰经》的教义，作为穆斯林日常生活和行为的指引。索马里穆斯林占人口多数。1991 年索马里政府瓦解后，数个奉行沙里亚法规的法院结成联合伊斯兰法庭，即 Islamic Courts Union 或 ICU，并一度成为索马里的主要司法体制。）

二是要认识到发生海盗的根本原因。于滨指出，目前成本很高的多边反海盗行动能够持续的时间必将有限，因此必须从根本原因上解决。海盗的存在就如恐怖分子一样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原因。John Brandon（亚洲基金会国际关系部主任）指出，除非索马里有更好的治理及稳定秩序，否则海盗问题就将继续存在。杨毅认为，最后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帮助索马里这个“失败国家”发展出一项全面的解决方案，例如集合国际力量去帮助其大力发展经济等。

八、小结

针对整个对话过程中争论不休的核心利益概念，该对话的中美双方召集人吴心伯和 Ralph Cossa 最后再次对之进行了总结性解读。Ralph Cossa 认为，“核心利益”应与“目标”、“战术”相区分。中美在战术使用上并不总是一致，但目标往往是一致的。如果未来关注的重点放在利益、目标上，这将对中美关系有利。以台湾问题为例，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实现它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维持台海现状。确切地说是短期内维持现状，长期目标是改变这一现状并实现和平统一。

而反对美国的对台军售就是涉及的战术之一。虽然中美战术不一定一致，但至少从短期目标来看，中美是一致的；就长期目标来讲，中美也并不一定存在冲突。美国的长期目标是和平解决，而中国是和平统一，前者并不排斥后者，但拥有更广泛的可能性。吴心伯则认为，虽然中美有不同的核心利益定义，但是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等同于帮自己的忙，因为如果不尊重对方的利益则可能招致对方反击从而损害自身的利益。因而，中国是否清楚美国售台武器的理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而言，这与自身的核心利益有关，中国不能接受美国对台售武而且必须要做出反应。

相比历次对话，本次对话中全球治理议题的增加是积极和重要的进步。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者回顾了一年来中美双边关系和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新发展及其涵义，分析了美日同盟对地区安全的可能影响，讨论了两岸关系的现状、前景以及美国的作用，探讨了朝核问题的可能走向及其对东北亚安全的影响，比较分析了中美对外援助政策以及反海盗实践的异同与合作前景。与会者还就哥本哈根会议的意义以及中美如何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中美双方代表虽然在不少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一致认为这一对话提供了中美相互认知和讨论的平台，有助于中美两国增加相互信任和合作。